

张军 著

话说

企业家精神、
金融制度
与制度
创新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话说

张军 著

企业家精神、
金融制度
与制度
创新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说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与制度创新/张军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208-03923-2

I. 话... II. 张... III. ①企业管理-通俗读物

②企业-金融体制-通俗读物 IV. F27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8738 号

责任编辑 张 启

封面装帧 王晓阳

**话说企业家精神、金融
制度与制度创新**

张 军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25,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3923-2/F·805

定价 13.60 元



1 作者的话

这是一本尝试用轻松的“谈话”方式来讨论企业家精神的发现机制和制度创新的著作。我希望这本书与我以前出版的著作有不同的风格,因而也期望阅读这本书的读者能比阅读我其他著作的读者范围更宽广。我确实认为,本书涉及的是一个对所有关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前途的人都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如果这本小书能为读者进一步思考中国经济的前景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路的话,我就认为实现了自己写这样一本书的目的了。

从金融制度的创新来认识企业家的成长和角色,是我最近一年多观察和思考“新经济”的主要收获之一。在繁忙的研究、教学和行政事务之余,我对这两年频繁见之于媒体的“新经济”的大量报道和分析文章多有关心。事情常常是,一件新闻报道或一个故事,能让我想到过去曾经读过的一本书、一篇文章,或想起一个论点,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就

记录下来,点点滴滴,再加上我平时所积累的一些剪报,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并不完全是针对书的“读书笔记”。因此,也不妨把这本书看成一本这样类型的读书笔记。我想,读书笔记也好,随笔也罢,以这种形式来谈论一些思想比正式的理论著作更随意些,思想性更强一些,当然也就更容易与读者进行沟通和对话了。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有机会在许多正式的场合发表我对企业家精神和金融制度创新的一些不太成熟、也未必正规的观点和思想火花,却引起了企业界、金融界和学术界的很多朋友的兴趣与支持。1999年,我有幸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上海)容正投资咨询公司主办的“经理持股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大型研讨会,在会上我作了“企业家精神:一个经济学的观点”的演讲。之后不久又被邀请参加了上海证券报和中银国际集团的“香港创业板市场上市推荐会”,作为嘉宾,我又作了“知识、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报告。我还被邀请在山东北洋集团举行的一个大型研讨会上专门就“企业家精神和制度创新”的问题发表了演说。这几次演讲还引起了新闻记者的兴趣,使我在那段时间里不断接受来自电视台、电台和报社记者的采访,谈论企业家和制度创新的问题。

2000年3月,在陕西财经学院(现与西安交通大学合并)授予我该院客座教授的仪式上,我选择了“企业家精神和金融制度”作为我的回报演讲。6月,我应邀为江西财经大学的“王弘远经济学讲座”作了首场演讲报告,也是这个题目。9月,我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名博士经济论坛”和山



东大学经济学院的“秋季报告系列”均作了首场演讲,进一步阐发了我对企业家精神和金融制度创新的一些想法。

可是,尽管我为准备这些演讲和报告花费了一些时间,但很多内容还是带有相当大的即兴的成分。后来虽然我的一些发言被从录音转换成了一些文字的东西,并在一些报纸上(包括《解放日报》)发表过,但我并没有真正能把这些认识与思想整理出来的机会。一个偶然的场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对我的这些话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希望我能在去美国之后“躲”在哈佛把这些想法整理出来,尽快出版一本书。来哈佛前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面为我送行,在场的编辑再次嘱托此事。就这样,我携妇将雏,甚至忘记带棉衣就匆匆离开了上海,飞往美国。

到哈佛两个月以来,我几乎停下了对中国工业经济和金融制度改革的研究课题,连周末也用来写作本书了。但毕竟身在哈佛,无法享用自己在中国的藏书(包括学校的图书馆)来“充实”我的思想,使我有时显得非常痛苦和无奈。还好有了“电子邮件”,使得在我急需时,我在复旦大学的学生们还能为我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我回忆到,10多年前我在复旦读书时曾对复旦大学校长华中一教授的一篇谈“硅谷”的科普文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在写作本书时又想起了这篇文章,你可以想象得出,坐在哈佛办公室的我显得多么的无奈。于是我给我复旦的学生发去了电子邮件,告诉他大概如何可以找到这篇文章。让我惊讶的是,我的学生居然在复旦大学出版社买到了一本华教授最新出版的科普文集《头脑风暴》,我需要的那篇精彩的



文章《硅谷夜谈》正收在其中,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如前所述,这本书不是一本纯学术的著作。我尝试用“谈话”的方式来表述我的思想。对我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虽然我也喜欢写一些随笔性的文章,也出版了两本随笔集(一本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经济、社会与文化:张军随笔集》,另一本即将在北京的三联书店出版,起名《走近经济学》),但在写作时要写出一种随意的风格和精彩的文字,对于我也并非易事。特别是,当涉及一些重要的理论需要转述和说明时,我还是想保留一些理论分析的最简单的工具(数学表达和图表表达),因为我认为,对于有一些数学基本知识的读者来说,看到函数式和图表也应该是愉快的事,与文字搭配起来也许会增加一些“美感”而不会太影响整本书的风格。

关于这本书的思想,我想在这里先作一个概述。其实,就想法本身来说,是十分简单的。我想,企业家精神作为一个社会的稀缺资源,它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作用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认同。可是,企业家的成长是一个社会发现的过程,它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制度环境,甚至它本身是靠制度筛选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企业家,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企业家的精神,我们可能缺乏的是发现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现有的制度不能很好地“甄别”企业家的才能,从而不能很好地使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更有力地来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以,把企业家精神的问题放到社会经济的制度中来思考,以此来看待社会对它的选择和它的成长过程便是本书所提供的基本



视角。

但回顾一下经济学的思想发展,我们的确很少看到经济学家对企业家精神的大量研究成果和思想的发展。正如我将在本书第4章谈到的那样,“从总体上来说,在经济学的思想史上,企业家精神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尽管经济学家对企业研究已经十分的深入。即使对企业家精神有赞美之词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回答社会和经济制度对企业家成长方式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大量的文献中看到的其实还只是一个‘厂商理论’,而不是企业家的理论。后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有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捡起一个古典的问题:为什么是资本雇用劳动而不是劳动雇用资本?这个问题本身实际上对厂商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个问题被提出来就等于已经让企业家精神的问题浮出水面了。而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也要面临‘谁应该是企业家’这样的问题。因此,在我们看来,‘资本与劳动谁应该当老板’这件事是我们走向认真研究企业家精神问题的重要一步。”

我在本书中表达的观点是,对具有创业精神和风险偏好的企业家才能的发现过程其实是一个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依我之见,所有的制度创新几乎都有利于和有助于对企业家精神的“甄别”和企业家能力的实现。以企业制度的创新为例,公司制的出现降低了企业家筹资的成本,从而促进了企业家的创业活动。降低企业家创业活动的社会成本是企业成长这个社会过程的重要特征,一旦创办自己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了,企业家就可以通过选择创办自己的



企业来和其他人区别开来,这个区别的过程就是社会发现和遴选企业家人才的过程。

基于同样的道理,资本(市场)制度(包括证券交易所的产生)的创新与发展对企业家才能的发现过程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有了直接的融资活动,如果一个企业家可以通过直接的公司融资而不是通过银行的信贷来获得创业的资本的话,那么,正如我在第5章谈到的,首先融资的风险就降低了。银行是拿存款人的钱发放贷款的,所以银行要把贷款的风险作为首先考虑的问题。归根到底,银行是要承担信贷风险的,它必须向存款人负责(存款的保险只能部分减轻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这样,而且存款的保险还带来其他的问题)。而对于直接融资,出资人是自己承担自己的风险。风险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自然不会有对安全的过度担心的问题。第二,改善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像购买股票或入股企业这种直接的融资活动,它们是个人的自愿行为。因此,如果有直接融资的渠道,那么进入直接融资市场的人应该都是愿意冒险的人,保守的人都把钱存入银行了。所以,直接融资市场的存在把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人加以区分开来,这也应该被理解为金融制度的创新。有了直接的融资活动,资金的配置更有效率了,因为在银行得不到贷款的企业家现在可以进行创业活动了。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直接融资也充当着甄别企业家的功能。因为,有了直接的融资制度,解决了资金问题,创业型的企业家就可以与管理型的企业家区别开来了,这时候,一个创业型的企业家是通过选择创办自己的企业而不是选择管理别



人的企业来证明自己的企业家才能的。

正如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所说,与银行制度的产生一样,有限责任公司和资本市场的产生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我的理论是,这些金融制度的创新不仅将有财富但风险偏好不同的人区别开来了,而且将企业家的类型也区别开来了,从而使资本家或投资者与企业家有更好地进行“链接”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新经济”其实是新型企业家的经济,而新型企业家的出现是金融制度创新的一个社会过程。

我将在本书第2章就IT产业中的创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链接”进行讨论,我想说明的是,其实在那里,风险资本的出现正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又一创新。有了这个制度的创新,像盖茨这样的新型的企业家才能恰到好处地被甄别出来而获得创业和成长。而类似这样的金融制度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实现,早已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过程。这个关系决不是今天首次出现在“新经济”里面的,我想在本书中说明的是,这种关系经过我们的理论分析可以更好地用来理解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基于这样的思路,我在本书的第6章谈论了制度的创新问题。根据我的理解,一个现有的完善的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相当保守的,制度一旦形成并被遵守,经济活动将被纳入一个“循规蹈矩”的体制内,经济活动的展开主要沿制度约束所给定的方向进行。从经济学所遵循的理性传统来看,这个经济将走向我们在教科书上整天所涉及的那个“静态”的效率最大化。但如果我们关注得更多的是增长的问题



题,是结构变化的问题,我们会看到大量的“变化”和不一样的东西。比如,我们看到的可能不再是企业的扩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而是大批新型和新兴企业的出现,看到的是熊彼特所说的那个“新的综合”和“创造性的毁灭”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是“企业家精神”而不是制度变得更重要了。因为有了自由的企业家精神,这个过程才可能出现。

当经济活动受到制度的制约而变得非常保守的时候,那些不“循规蹈矩”的、爱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是怎样出现的呢?我在书中说,“企业家精神的出现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可是,在一个受现成制度约束的经济里面,创新何以发生?依我的观察,即使再完善的制度,也不过规制了一部分或很大一部分的经济活动,换句话说,总是存在着活动在‘体制外’的民间的力量。他们是创新的源泉。这些活动可以是地下的经济活动,也可以是公开的和合法的‘擦边球’活动。无论如何,这些活动都是在‘体制外’的、边缘上的民间活动。制度的创新往往就是在这里酝酿和推动的,就是从不受制度保护因而没有制度所造就的既得利益的那些蕴藏在民间的力量开始的。所以,我的观点是,谈制度创新,从而谈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对民间力量不该有忽视,更不该有歧视。站在创新活动和企业家精神的角度看问题的话,承认民间活动的创造性和合法性也许比一味地完善现有的制度更重要。尤其对我们这个经济增长潜力很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充分认识民间力量在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是关系到我们经济未来成长的‘战略’。”所以,这也将对我国的政治发展提出新的任务。



我相信,我在书中所谈论的东西必然涉及一系列经济学的理论问题。而在这本小书中,尽管我始终按照一定的逻辑来讲述我的思想,但我在许多场合还是试图回避对理论的构建。我不想论证什么,只是谈我的想法和对问题的一些分析。也许看待问题的有些思路和想法今后可以发展成为一个理论,这当然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这部小书仅仅是提出了问题并给出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引起读者对这些问题兴趣和进一步对话的可能性。

我说过,自从来到哈佛大学我就投身于本书的写作。事实上,来到这里,我才有了足够的时间思考问题、整理文献并起草本书的初稿,这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所以,我要感谢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为我提供的访问学者奖学金,使我有机会将在哈佛大学度过一年的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在过去的许多年,我始终得到众多朋友和组织机构的支持与帮助,为我的经济研究工作提供了众多的学术交流机会。这是我学术生命的重要基础。例如,仅2000年以来,我就有机会应邀在祖国大陆的数所大学讲学,除此之外,我还在台湾东华大学、澳门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剑桥大学、威尔士的班格尔大学和东京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参加会议或者进行拜访活动。为此,我对这些年来始终关心和支持我的研究工作的许多国内、国外的同事和研究机构、基金会的负责人表达我的衷心谢意。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爱妻王小丽女士,她对我的生活和



研究工作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毫无疑问,她对家庭的贡献远远超过了我。在美国,她还担当了儿子的家庭教师,尽管不是全日制的。当然,我也深知每当我离开家时我可爱的儿子对我的想念之情是多么的深厚。

张 军

2000年12月3日记于哈佛大学

2 走近“新经济”：经济学家的思考

2.1 “硅谷”幻想曲

1999年以来，一本讨论美国硅谷和 128 公路的书在中国国内颇为走俏，也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注意。原因很简单，当国内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都在复制（眼下时髦的话叫“克隆”）美国“硅谷”的时候，总结一下美国东部的“硅谷”——麻省 128 公路几乎失败的教训，对照一下现在的硅谷成功的经验，自然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

我和 128 公路有些缘分。很多年以前，我曾对王安的自传《教训》产生极大兴趣。王安是“王氏”（Wang）电脑公司的创始人，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在哈佛大学攻读电机，最终走了创业之路。《教训》这本自传主要是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精神冲突的一面。王安显然认为，王氏公司的失败是这种冲突的必然结果。他并没有更多地谈



论“128公路”衰落的教训,不过,王氏公司及其研究院真的是坐落在麻省理工学院(MIT)附近的128公路旁(我还清楚地记得《教训》中的那幅研究院的照片)。今天我来到了离这里不远的哈佛大学。我周末常常步行到麻省理工学院,穿行在128号公路旁的那些新型建筑群中,甚至坐在查尔斯河边远望波士顿海湾全景时,我总是想到王安和王氏公司的“教训”。当然也常常想象坐落在美国版图西岸的旧金山湾的“硅谷”现在的模样。

5年以前,我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客座时来到过旧金山湾,对“硅谷”则望“海”兴叹。但我对“硅谷”的好奇心最早来自复旦大学前校长华中一教授的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硅谷夜谈》。这篇发表于1986年11月20日《文汇报》的长文(约1.5万字)至今由我收藏着。遗憾的是,这次来哈佛时并没随身带来,所以当我需要再谈它时,一下子措手不及。好在我有学生可以帮助。他很快从复旦大学出版社弄到了一本华中一教授的新著《头脑风暴》(2000年9月第1版),书中恰好收入了这篇文章,使我坐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里可以重温硅谷的“幻想曲”。

“美国的硅谷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在《天方夜谭》的故事里,大家曾听到过沙土变为黄金的神话。但《硅谷》一书的作者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Rogers)说硅谷比它更为神奇:‘他们把黄沙变为智力’。”

但是,华中一教授说,你在美国地图上找不到“硅谷”的。它既不是一个城市的名称,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山谷。硅谷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南端到圣荷塞(San



Jose)之间的一个长约 50 公里、宽约 20 公里的狭长地带,由一条叫做皇家大道(El Camino Real)的几十公里的长街连接起来(见图 2.1)。这个区域以前叫圣克拉拉郡(Santa Clara County),1950 年前这里盛产梅子,以至于这个区虽然只有 800 个工人,其中却有半数在罐头厂和果脯厂工作。电影《蝴蝶梦》的女主角琼·芳登小时候在圣荷塞附近跳过一次节日花柱舞以后,还被称为“梅脯产区的美女”。而现在这种果树已经完全消失了。到 1982 年时,代之而起的,是 3000 个“商行”(包括 2736 个独立工厂、264 个分公司),生产全美国三分之一的集成电路和八分之一的电子计算机。

“硅谷”这个名称,据华中一教授考证,是 1971 年在《微电子新闻》上唐·霍夫勒(Don Hoefler)首先使用的。“硅”(理论上可以从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的黄沙中得到)表示半导体芯片,是这一地区高技术工业的基本产品,而“谷”的一边是太平洋沿岸的群山,另一边却是旧金山湾。当然,后面这一点与“谷”的定义根本不符。因此,当时有人认为霍夫勒可能是想借用半个世纪以前轰动一时的田纳西河谷庞大的水利工程的盛名来哗众取宠。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硅谷这一名称家喻户晓的程度竟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水利工程。现在这个名词,已经广泛地同奇妙的电子产品和闻所未闻的新兴工业相联系。硅谷是袖珍计算器、电子游戏机、微处理机、个人计算机、无线电话机、激光技术和数字手表的发源地。在过去 20 多年中,在电子学方面的每一件新花样几乎都源于硅谷。在“硅谷”,从帕洛阿托(Palo Alto)开始,是斯坦福大学和斯坦福研究园区(Stanford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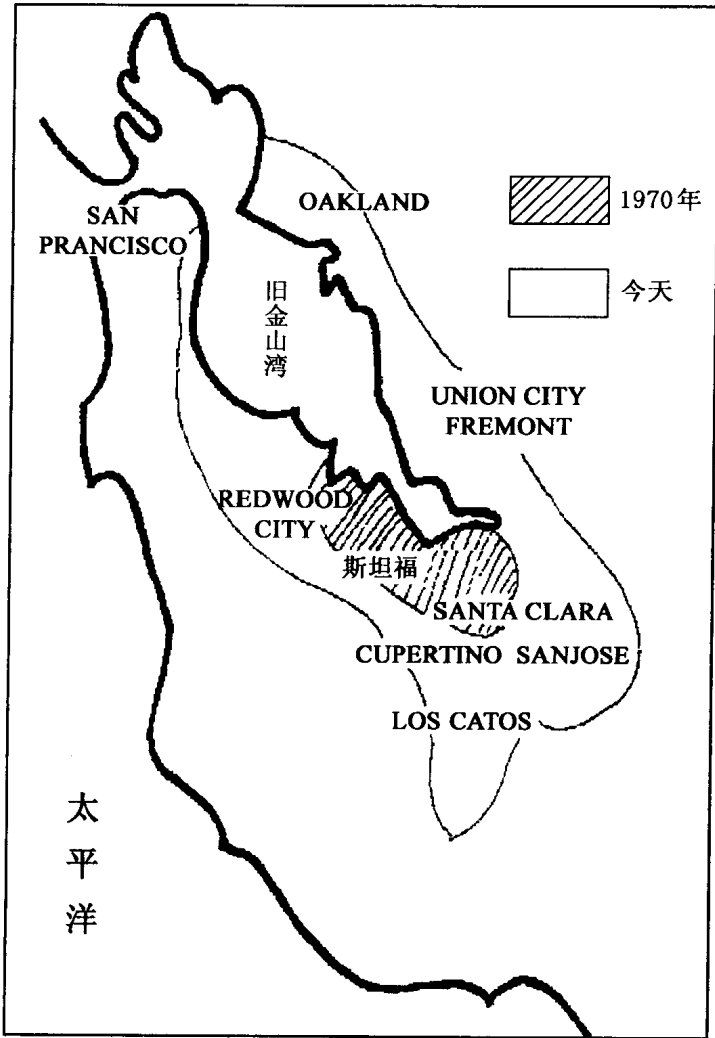


图 2.1 硅谷不是“谷”

资料来源: H. Rowen, 2000, “The Silicon Valley 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在上海的演讲稿)。